

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
云天恩
拉曼大学中文系
二〇一七年四月



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 ——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

云天恩

SAMUEL HOON TIAN EN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7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 ——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

科目编号：ULSZ 3094

学生姓名：云天恩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黄丽丽 师

呈交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文献回顾.....	3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	6
第二章 金枝芒：抗英战争之叙事（1948-1955）	8
第一节、“南来文人”与“马华文艺”	8
第二节、《饥饿》：“文史互见”的现象探讨	12
第三节、小结：溃灭与重生.....	21
第三章 驼铃：再现国内革命战争（1961-1989）	22
第一节、“文史互见”与“抢救记忆”	22
第二节、《寂寞行者》所勾勒的历史之人、事、物.....	24
第三节、马来马共.....	31

第四节、小结：回顾与反思.....	34
第四章 海凡：最后的马共心曲（1976-1990）	35
第一节、以“潜在书写”检视“心史”	35
第二节、“过来人”的日记.....	39
第三节、小结：归来.....	47
第五章 结语	48
第六章 参考资料.....	51

图表

图一、被歼的一支队伍-----	15
图二、英军士兵及受害者的头颅-----	18
图三、马共游击队中的少年-----	20
图四、阿都拉·西·迪夫妇与陈平夫妇-----	33

论“文史互见”视角下的“马共书写”
——以金枝芒、驼铃、海凡为例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是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所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在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 14ALB01578

日期： 2017 年 3 月 31 日

摘要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在历时半世纪的斗争中，留下了不少以这段历史为主题的“马共书写”。本文所要讨论的“马共书写”是特指由具备马共身份以及直接或间接介入马共而熟知其历史的作家。这些“局内人”书写者所留下的“马共书写”，不仅带有时代色彩的烙印，也是这些历史亲历者的思想投影。

本文以三个不同世代与身份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三名作家的作品代表了抗英、国内革命战争（内战）以及“和解”后“最后的马共”之处境。金枝芒是“南来文人”，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承左联现实主义的写作观，故其长篇小说《饥饿》具有报导此时此地和内心变化的作用。驼铃虽不具共党身份，却由于自觉自己和这段复杂的历史悲剧纠缠在一起，是故他有意“抄写历史”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海凡于 1970 年代上队，1989 年“和解”，历时 13 年的革命历程曲终人散。作为失去“历史使命”的“最后一人”，其回顾与反思成为考究马共成员思想变化的重要依据。

三位作家的作品虽然以小说或散文的文学形式呈现，但其中内容无不反映历史，突出了“文史互见”或“文史互渗”的现象。

经过研究发现，他们的作品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反映了独立人格在群己轻重间的挣扎、还有独立的思考和批判，是解读马共思想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书写、局内人、文史互见。

致谢

论文成功杀青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黄丽丽老师。这份论文是我们师生俩一同努力、学习的成果。我自认文学造诣仍有进步空间，但是秉持着写论文是互相学习的原则，我觉得获益良多，也进步了很多。论文成为我们一同努力的心路历程。只要有心，必能成事。

我要感谢方美富老师，一年来，老师也有介绍我各种参考书目，以至于本文得以从多层次的视角去诠释这段历史。因为“马共书写”离不开历史和政治的纠缠，我们需要全方位的视角，才能让局内人的作品活起来。也是由于方老师的鞭策，我的论文才有不断的超越。

我要感谢何启才老师，我作为一名初涉左翼运动史的素人，初见何老师时确实是“小巫见大巫”。我要感谢何老师为我讲解马共的历史、借我相关的参考书目、还不厌其烦地提供我各类参考文献，实在感激万分。能结识何老师，实在是人生一大幸矣。

这一年来，走访过国家档案馆、华社研究中心集贤图书馆，也时常在图书馆埋首研读马共史料，作为“异类”，确实每天提心吊胆，深怕踩“政治红线”。这一年来，要感恩家人的支持与朋友的鼓励。我因忙碌无法陪伴他们甚是惭愧。我要向他们对我的忧心致以歉意。艰辛的历程让我成长了，虽然也吃过苦，但感谢主，因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感谢之人不分先后，论文的成功是你我共同努力的成果。谢谢。

第一章 绪论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成立于 1930 年，其历时半个世纪的斗争中，不乏其文学产物——“马共书写”，即是指以其历史为情节而展开的文学创作（潘婉明，2011：442）。而“马共书写”的相关作家包括“局内人”和“局外人”。前者即具备马共背景或同情马共运动也熟知马共历史的无党籍者，他们的作品多忠于现实，基于共党身份和经历，他们的作品离不开历史和政治。后者则是一般将马共主题视为美学素材的非共党作家¹。

“局内人”的作品有“文史互见”的功能，故存在“史学价值”。此类作品既能反映一段历史，也是作家思想的载体。本文推选三位“局内人”作家——金枝芒、驼铃和海凡作为研究对象。除了身份之特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马共书写”可填补“马共三部曲”²经典不足的局面来与历史相互对照。

金枝芒是南来文人，其经典《饥饿》代表抗英战争，忠实地报导了“此时此地”的困境。驼铃是唯一马来（西）亚籍的作家，他的作品《寂寞行者》涵盖了马共斗争的历程，尤其他所写的肃反，可以弥补经典不足，又以文学抢救历史，让记忆不至湮没。海凡是新籍马共，也是最后的马共，《雨林告诉你》的《和平村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真实地纪录了部队成员的内心变化和理想幻灭感，尤其下层士兵对于《合艾和平协议》的观点。

¹ 如黄锦树、小黑等人。

² 黄锦树主张“马共四部曲”：韩素音《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抗英前的酝酿期）、金枝芒《饥饿》（抗英战争高峰期）、《肃反》（《新方针》后的马共内部暴力，这是为一“经典缺席”的部分）、《伤害》（马共“和解”后留下的历史伤痕，驼铃《硝烟散尽时》、海凡《和平村日记》都可视为经典。）（黄锦树，2015：354）

借助三作家“文史互见”的作品来看历史、可将其归纳为本文三大部分（抗英、内战、和解）。此外，本文以“文史互见”视角切入，也为了寻求另一突破，即“马共思想史”之初试，因为作家的作品是其思想的投影。

第一节、文献回顾

1.1.1 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类

“马共书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56 年的《餐风饮露》³，自“紧急状态”到“和解”前⁴，以马共作为写作主题或母题的作品，更多时候基于政治的限制，只能从反共立场或者殖民者的角度⁵出发，1990 年代前，“马共书写”一直是敏感课题，较多见的是属于美学类型的创作。1990 年代后，前马共成员也开始出版昔日在部队中的文学作品，从而使“马共书写”有条件从左翼文学中自成一家。潘婉明的〈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是从文学史角度、有系统的整理“马共书写”的意涵。潘婉明治马共史，也提出“马共书写”是可窥视历史的文学。黄锦树的《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则着重于现实主义的原则讨论“马共书写”，并认为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有“经典缺席”的不足，例如“马共四部曲”应该依序是：《衣以风、餐以雨》、《饥饿》、《肃反》和《伤害》，唯独没有肃反的经典。

³ 韩素音著...And The Rain My Drink

⁴ 1948-1989

⁵ 包括“报告文学”还有各类褒贬的立场，如韩素音是同情马共斗争的，其余作家（英文世界）都将马共斗争视为“叛乱”（Insurgency）。

1.1.2 历史文献和专著类

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需要相关的文献和专著才有助于我们理清文中各类故事情节。如潘婉明所述，第一手资料—文集的编撰工作尚未成熟⁶，今天所见的各类马共文集都出自 21 世纪出版社⁷，由方山督印。虽是一手资料，但大多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色彩。陈剑是马新两国左翼运动史的权威，和方山不同的是陈剑更具历史学者的人文关怀，陈剑的贡献主持口述历史记载和协助当事人编写回忆录。此外，还有何启才、魏月萍、钟怡雯等人的研究成果则是不断地在完善化马共研究的议题⁸。

此外，英文世界偏重从冷战—世界史的角度入手，较著名的包括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⁹、T.N. Harper 的著作。前政治部警员 Aloysius Chin 的著作就较为全面地根据警方所得情报去建构这段历史。SouChou Yao 的著作代表相关研究的新趋势，他认为让历史回归历史（Yao, 2016: viii），是个较“人性化”的史观¹⁰。

⁶ 详见：潘婉明〈马来亚共产党——历史、文献与文学〉（黄锦树，2013：303-331）

⁷ 主要的作品如马共文集《马泰边区风云》第一至四集、《历史的告白》等。

⁸ 何启才的〈马来亚共产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则梳理了迄今为止各类型的马共研究，按照课题来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类：较常、较少和极少、尚未研究的议题。（何启才，2013：38）魏月萍的研究成果〈马来马共的论述与制约〉则较全面地勾勒了马来马共的起源与发展。钟怡雯的〈历史的反面与裂缝〉将马共的回忆录进行分析，所得结论正是此文类可以作正史的拾遗。这些作品都是应历史和政治而生的，可以填补各种正史的空缺。

⁹ 谢文庆提出当前马来西亚历史研究的八大主题，也包括了马共、左翼运动史的主题。（Cheah Boon Kheng, 2007: 253-263）

¹⁰ Dr. Yao 偏向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轮番站在不同的立场去诠释这场解殖运动而招来的内战、乃至小型的世界大战（截至 1957 年，英联邦已经增兵 4 万人）

1.1.3 思想类

何启才认为当下马共思想研究是为“极少、还未研究的议题”（何启才，2013: 38）除了杨进发（C.F. Yong）的著作尚可被接受。目前确实欠缺研究马共性质的著作，故笔者只得借殷海光¹¹、高华¹²著作来解释共产党的属性，借夏济安¹³、钱理群¹⁴的论著来探讨马共作家的思想，是一种借中共研究来研究马共的方式。因为共产党的性质是一样的。

¹¹ 殷海光著《光明前之黑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译《到奴役之路》。

¹²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¹³ 夏济安著《黑暗的闸门》

¹⁴ 钱理群著《我的回顾与反思》、《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等。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

潘婉明提出马共书写有“‘以文述史’或‘补史之阙’”的作用，但是不可作为文献引用。（潘婉明，2017：129）同时她认为作者、文本乃至作者身处的时代环境均紧密相连（潘婉明，2011：452）。受潘婉明的启发，且何启才表示目前对于马共思想史的研究还尚未成熟，故笔者有意从作家身世、书中人物情节乃至所书写的时代、写作时身处的时代入手，从而尝试去论证潘婉明的理论。

此外，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揭示茅盾作品有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的复杂关系，尤其提及“编剧历史”论还有老舍写实主义的表现性和动人性（王德威，2011：3）、巴赫金的全集则提出小说中的“杂语”是作者思想的载体、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则提及“潜在写作”（陈思和，2002：66）。上述研究为我们解读作家局内人提供了参照。

我们不妨尝试从作品出发，再对照真实的历史，尝试拼凑成一部跨越 40 年的马共斗争史。马共作家局内人的作品文风质朴，似无太多文学价值可叙，然而正是由于其忠于现实而突显其史学价值所在。作品是作者思想的投影，透过解读文本情节以及作者融入的思考与批判，或许可为马共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另一种方法。

魏月萍强调探讨马共的历史“必须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冷战格局与中苏共关系史”¹⁵（魏月萍，2011：18）要把握“世界潮流—本土政治与社会—个人思想”（魏月萍，2011：19）三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尤其对于解读马共局内人作家更是如

¹⁵ 转引自潘永强（2009），《陈平是冷战的弃婴》。读取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106678>（当今大马）

此¹⁶。研究必须要透过他们的身世背景和写作时代，以“文史互见”的方法探勘作者思想，而马共局内人的作品，其最大的史学价值便是思想史的价值。

¹⁶以金枝芒为例：考究南来文人的生平，尤其“北江人”，就不得不留意江南地区对中国革命的地缘性价值、金枝芒考入师范时年十七岁（1929年）。当时有一位先生倡导白话文运动、鼓励学生阅读革命书籍并且力保那些因参与罢课、学潮的学生（据吕方上的考究，这是已经政治化的学运）。因为当时的文人意识到要改变就要参与革命。于是透过先生介绍他加入了第三党。此后，他从事过文教工作，又投身革命运动，若参照李泽厚的划分，属于第四代知识分子（李泽厚，2008：480-481）。综合史料，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历史轮廓：金枝芒南渡前正处于一个巨变的过渡时代。这个巨变涵盖了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反革命等纠缠不清的局势。故笔者从解读《饥饿》可以看出现实主义的写作和作者还有他的身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延续了左联那套风格还有鲁迅“写我眼中所见的灵魂”之原则。

以《饥饿》“文史互见”的现象为例，说明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是作者思想的载体：如石古本身就是一个对枪声很着迷，一个勇字当头，不顾后果的人物，石古专用的枪支是士丁枪（Sten Gun）是一种冲锋枪，也符合石古喜欢冲在前线的性格。蛮仔的形象象征着年轻人，在故事中仅十六岁，金枝芒设置蛮仔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位年轻人的视角来检视这场战争。如蛮仔“政治不正确”的对白：“革命的道理我还不大懂，但是不怕流血牺牲去打倒英帝，解放人民，死也跟着共产党，却心里有个底。我也知道一点革命事业的光荣伟大”（金枝芒，2008：91）这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让一名少年重新省思自己的选择。

第二章、金枝芒：抗英战争之叙事（1948-1955）

第一节、“南来文人”与“马华文艺”

金枝芒（1912-1988），本名陈树英，生于中国江苏常熟。1936¹⁷年南渡，属于南来文人。南渡前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洗礼。1943 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战后的论文〈谈马华文艺〉强调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¹⁸，并且要秉持表现此时此地的原则。

他表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就要忠于现实”（朱齐英，2009：162）这为其后的抗英主题著作奠定了实践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南来作家作品“本土化”的转捩点。金枝芒认为文艺主题要摆脱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朱齐英，2009：164），但是写作的思想确是“五四”文人精神本土化。

金枝芒随部队转战边区，有军事经验，且作为文宣员¹⁹，他有审稿之便，可以先过目同志的一手文稿；另一方面他肩负教育同志的职责，所以他也负责为口述

¹⁷庄华兴（2012）。金枝芒系年，引自：http://freesor.blogspot.my/2012/02/blog-post_8658.html。

¹⁸“这是因为要为此时此地的人民利益服务，必须要表现此时此地的现实，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和人民斗争，从而可以说：一切文艺都是有‘独特性’的，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朱齐英，2009：162）

¹⁹《十年》是一次集体创作，金枝芒呼吁：“好好阅读这些作品，细细回味这些作品，并且自己也热烈参与写作吧！这是对你，对人，对我们的伟大的事业，都有所帮助的”（21 世纪出版社，2013：4）、“《十年》所写的事情，都是真人真事...同时，为了严密，为了使事情不致不合党的政策，为了使毫无意义的东西出现，有时就不得不作某些删节。这自然无损于真人真事的真实的面目”。（21 世纪出版社，2013：5），

者撰稿²⁰。过程中可提炼出写作素材。所以《十年》转向《饥饿》的过程是金枝芒的“马共书写”从采集题材到自成一家的发展轨迹，呈“百川汇海”之势。《十年》是《饥饿》的雏形阶段。本身的经历、战友的口述、结合“此时此地”再虚构一个写实主义的《饥饿》，所以，黄锦树和潘婉明都不约而同地提出有其文史互相渗透、表现此时地的真实等特点，且认同《饥饿》堪称金枝芒的巅峰之作²¹。

纵观金枝芒的一生，他有多重身份和经历：南来文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共产党员，见识过中国底层的社会、感受过新潮对道统的冲击、与儿子承赞的离恨、见识过侵略者和殖民者的残暴、悲痛于新生儿早夭、深入过马来半岛边缘人的群体中等等。这些都型塑了金枝芒的心理，这也是他个人对于现实和生死的领悟，尤其承袭了“五四”的写实、批判精神，并且用于解释现实。从而使得他的作品忠于现实，虽然其马共书写是其入党后的作品，但是在所谓“政治正确”的框架下，仍然有其忠于现实、独立思考的批判性文风²²。

据马阳考究，《饥饿》受俄罗斯小说《毁灭》所启迪，但不是模仿（21 世纪出版社，2013：262）。陈秋舫也特别提及金枝芒热爱阅读俄国小说（21 世纪出版社，2013：333），《毁灭》的中文版由鲁迅所译，并且为之写译后记。这是一

²⁰ 这也说明了部队的文化水平并不高，金枝芒的编后记也间接承认这一点。（21 世纪出版社，2013：209）

²¹ 金枝芒的作品和革命紧密相连，他用了文学来修饰他所要叙述的“报告文学”，故不同于其他凭空创作的文学家，他是直接描写的。如写强暴者的粗暴，潘婉明认为金枝芒在“既消费了女性的身体，也不具文学实质”（潘婉明，2011：456）。但是以文学来纪实、述史、宣扬革命理念，却能看出金枝芒的成就之处。若真要如潘婉明所述要激怒男性或鼓舞士气，那么黄锦树所整理的《死亡的面孔》（黄锦树，2015：324-325）则更到位地引领读者进入故事中的世界，去体会各种的悲壮和愤慨。金枝芒书写死亡，除了自身的行军经历外，也结合他本身对死亡的感悟，如他曾经经历新生儿夭折的痛苦，这是他在阅历过无数马共女战士因突围而被迫牺牲亲生骨肉的事迹后，所得的感悟。更是塑造“玉兰”的蓝本。细腻的描写垂死的心理状态和死亡的面孔，在黄锦树看来，金枝芒距离现代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²² 金枝芒：“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就要忠于现实”（朱齐英，2009：162）。

重要线索，我们不难发现金枝芒受中国左翼作家远至苏联作家的影响，谢诗坚的考据可以证实这一观点。特别重要的是近代以来，鲁迅和左联对马华现实主义作家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有红色光环的鲁迅”是主张书写工农兵阶层的，然而钱理群认为鲁迅应该是独立的²³，故有些文人他们所秉持的鲁迅观是一种对国民性的批判而非对工农兵的盲目歌颂。如我们阅读金枝芒的作品，一方面他透过写小人物的可怜来批判英帝，看似为革命而文学，却鲜少有人尝试去发掘金枝芒独立的批判性格，他是否也同时怀疑革命的意义呢。虽然金枝芒的作品离不开书写工农兵，讴歌革命的政治正确。但又诚如黄锦树和潘婉明都有共识的一令人费解的政治不正确，写尽马共斗争中的各种困境和缺陷。

金枝芒的作品有其历史价值，一来是忠于现实的纪实，二来则是可以填补马共书写所无法详述的部分——马共党员的个体心灵史，这不同于历史专著中的主观视角（包括官方和马共），也不同于回忆录中的自我视角。金枝芒的马共书写提供了各种思考的线索，从作家局内人的角度出发，他可以引领读者进入作者的世界，去思考和反思。以作者的角度来诠释每一个成员的心理变化，提供了另一种考究马共的参照资源。金枝芒的作品是一个“马共书写”的过渡期，正如金枝芒也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介于中国和马来亚之间，介于第四代知识人和南渡文人之间，而他作品的史学价值正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变化、个人内心的变化。尤其他的“马共书写”开始于 1958 年的《十年》系列，终于离开马境前的《饥饿》（1960），所以

²³鲁迅毕生奋斗的理念就是“书写我眼中的灵魂”（钱理群，2011：167-168）还有个体的心灵史，这点在鲁迅的小说中显而易见。金枝芒笔下的马共游击小队、阿沙族部落、边区马来甘榜，可说是鲁迅观的本土化表现。他写的个体心灵史，正是这些小人物，除了〈督央央和他的部落〉中小人物——阿沙族，还有《饥饿》中的成员，每一名角色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包括木匠、矿工、胶工、菜农等人物，包括被父权压迫的女性。这点可以参照《毁灭》的故事设定，虽不是模仿，但是相似度甚高。从阅读金枝芒所得的鲁迅观，需要从文本中抽丝剥茧地阅读与分析。

在历时 12 年的抗英战争中，他是参与者、亲历者和此时此地的记载者，故他的作品凝固了 12 年中的故事，成了考究抗英时期的代表作品。我们将透过考究其作品来探讨之。

第二节、《饥饿》：“文史互见”的现象探讨

关于《饥饿》所述的时空是较为模糊的²⁴，唯一可以让读者找到定点的应该是书中所述之年份即 1952 年，整体故事的发展是介于 1952 年新年前后的大半年中。

《饥饿》具有“凝固时空”的作用，关于《饥饿》所设定的历史背景是值得深究的，一切故事从 1951 年年末说起，是为“六·二〇”事件后的第三年，在马来亚偏远地区，共产党的游击队和附属的民运组织仍然对各地区有影响力，甚至是支配的作用，如老刘和他的队员都来自书中所述的四十碑、四十六碑和三十五碑，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深山中布置根据地，而民运组织则在地方上服务人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聚落都是属于草根阶层、边缘人，有菜农、木匠、矿工、山工、胶工等人。在英殖民当局重返马来亚前，此地遭遇日军的蹂躏，尔后则经历过共产党的短暂接管和重建。这点设置相似于其他马来亚战后的乡间聚落，霹雳州的聚落概况则与小说中的聚落有很高的相似度。

1948 年 6 月 16 日，马共在和丰击杀三名欧裔种植人，17 日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8 日殖民政府宣布“紧急状态”，20 日即著名的“六·二〇事件”，1950 年后，毕利斯计划将华人送入集中营以切断其和马共的联系。英军更为疯狂的进攻和报复，主要还是 1951 年葛尼爵士被杀后达到极点，这也是书中提及的，英国人在 1952 年才更为积极地“赶搬家”，把四十碑的居民集中监视。也派遣曾在巴勒斯坦作战的指挥员领军前往驰剿。用酷刑、枭首示众的方式打击村民的反抗

²⁴ 金枝芒舍弃了以往以“历史事件”为蓝本的创作手法。（潘婉明，2011：457）

意志。事实证明，无论心理战还是饿毙政策都是很凑效的，然而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双方都不得不寻求谈判的下台阶，才有了“华玲和谈”的一次转机。

此外，“文史互见”的现象还包括人物和故事情节与真实记载的高度相似。若我们以王德威的论述来诠释，则金枝芒的《饥饿》忠于现实（The Real），也忠于真实/真理（The Reality）。金枝芒书写现实、引领读者思考、细腻地描写小人物之个体心灵是一种“鲁迅观本土化”的概念，然而我们也意识到，究竟是要追求真正独立的写实，还是走向政治正确的写实？确实不好定义。

此外，王德威对于各类奉现实之名写作而生的辩证之总结包括：现实和历史、超越时间和铭刻时间、从美学净化和规范性中产生出模拟（Mimesis）和逼真（Verisimilitude）的辩证说²⁵都有其可观者。我们考究《饥饿》不难发现其写实主义兼具了模拟和逼真。透过对其人物群、情节的逐个探讨，便不难发现金枝芒的模拟和逼真实为从现实中寻找素材和蓝本，以虚构一个故事。

²⁵他表示：“‘模拟’指的是对世界客观亦步亦趋的仿拟，而‘逼真’则强调在任何仿拟行动中，让人信以为真的文化/历史动机。当然两者都必须包含语言媒介的介入。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叙事内在外在的传承动因，那么不论‘仿拟’或‘逼真’均属空谈。”（王德威，2011：5）。

2.2 现象一：人物原型

2.2.1 老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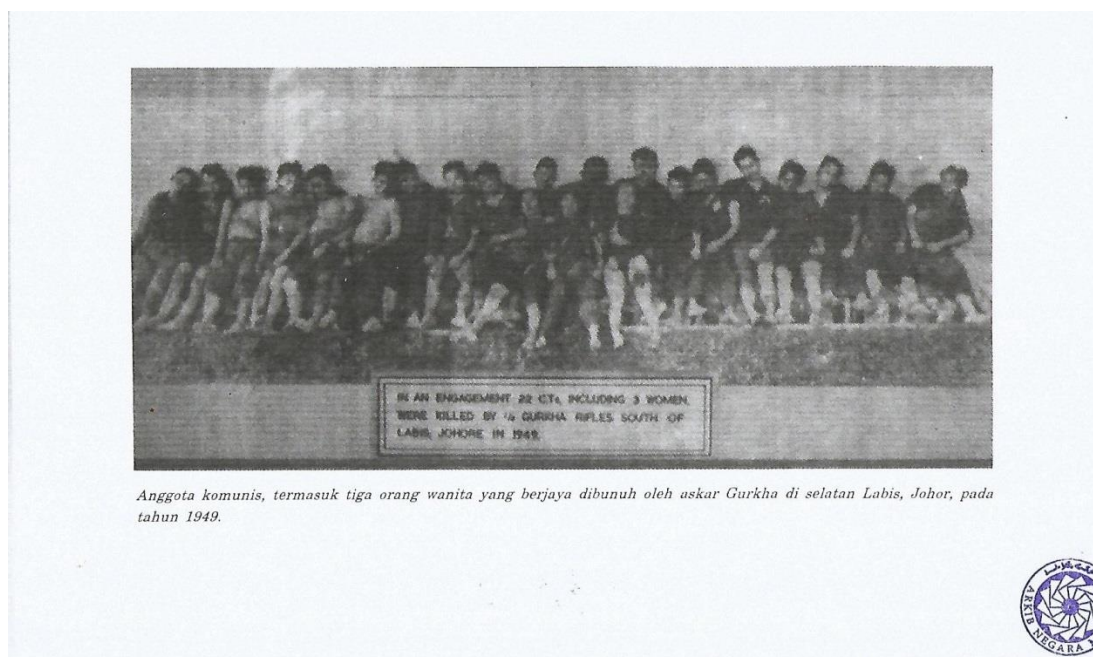
老刘是《饥饿》中这支被隔绝的小队队长，老刘是抗日军出身，金枝芒设定这个人物为老刘，想必是受了两位“刘同志”的启发。当然同时代也有相似的个案，队长未必姓刘。一是刘尧，刘尧是马共高层，1948年7月16日，因叛徒出卖被杀，遗照用于劝降的传单。但是刘尧的记载并不详细。第二位则是有“加影胡须佬”之称的刘观金（原名赵华），和老刘最大的相似处，就是他也出身抗日军，也同样在“六·二〇”以前就已经挖枪上山。在加影的新村建立后，尽管与群众隔绝，但是仍然在雪兰莪南部领导激烈的游击战，他也着手民运组织的工作，颇有战绩。尤其吸引了前抗日军战士、工人、学生上队，最后在遭遇战中为了营救一名女同志而左眼中弹身亡，遗体被运往巴刹示众。（林雁，2001：220-228）刘观金喜欢阅读共产主义读物²⁶，他受过教育，这点和老刘不大一样，《饥饿》没写老刘的教育水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刘观金或其他马共小队的领导人都可以找到老刘的影子。老刘这辈子是否对共产主义有一定参透，基于是小说的虚构，无从得知。

金枝芒转述道：

“他（老刘）说只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来赶走英帝、改造社会，消灭剥削制度，才能扫除人间的疾苦。他说这就是他参加抗日军，就是组织工农起来同英帝斗争的革命事业的目的。”（金枝芒，2008：61）

²⁶ 尤其《毛泽东选集》。

金枝芒写老刘时也将读者带入当中去思考，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²⁷，选择这种意识形态，且如何使用它，则始终取决于个人的领悟。一如老刘曾经经历日军的酷刑，意识到要终结压迫，就必须革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无论是老刘还是真实的刘观金，他们都受自身的社会启发，想借由自己的政治信仰来改变之。而碍于战争的残酷，最终在一声“共产党万岁”中殉道了，老刘凝固了金枝芒理想中的领导人形象。



图一、被歼的一支队伍²⁸

2.2.2 玉兰

玉兰是老刘的妹妹，抗日时期做过民运工作，战后同样做民运工作和部署抗英的战斗工作。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玉兰的原型并不难找，文中玉兰是打菜园长

²⁷ 殷海光：共产党的“坚执性”好比有教条的宗教。（殷海光，2012：118-119）

²⁸ 转引自：Wan Hamsah Awan (1994) *Baling Membuka Jalan Damai*, Selangor Kajang: Masa Ent.（国家档案馆藏）

大的女孩，从奸细黄东成²⁹对她的非分之想就可以让读者察觉到玉兰的处境非常危险（金枝芒，2008：10）。在战乱的时代，不少女性选择加入共产党以自保，也有不少是受家人的影响所致的，如老刘带领玉兰参与革命。在真实的记载中也有一名张玉兰，笔名波澜³⁰，她的父亲因支持抗英而被捕，被毆至重伤，出狱后不治，当时波澜的母亲在父亲过世后仍有支持共产党的革命，所住的瑶伦地区被圈起成集中营，且发生女性被奸杀后还被栽赃是女马共的案例。波澜时年 11 岁，个子高大，像个大姑娘，这也是母亲提心吊胆的地方（波澜，2015：5-8）。所以参加共党扛枪作战也成了女性自保的一种方法。一般上，女性党员的职责除了作战、炊事还包括医疗，如玉兰本身精通中医，而青莲也是她的帮手。书中也有不少对医疗、炊事的描写（金枝芒，2008：102）由此可见玉兰以极其简单的医术来治疗伤患，当然马共也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但是碍于环境他们必须在极度简陋的“手术室”里操作简单的医疗器具，邱依虹著作所提及的林东（邱依虹，2004：152-159），虽然具有医学的学历，但是到了战地要动手术是很挑战的事，包括处理食物中毒和地雷炸伤等战地常见的伤病，此外一些人则靠观摩战地医生学习医术，如阿探（邱依虹，2004：54-55）。据近期《星洲日报》的采访，马共游击队的医疗器具是极其简单的，这也是游击队致命的缺陷。

玉兰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内心的复杂的，尤其看见“饿毙政策”效果以渐进的方式出现。也犹豫自己到底该不该在此时怀孕，也觉得因自己成为累赘而内疚。

²⁹ 一川曾经提及一名名叫黄东成的逃兵，不过和这个“黄东成”不一样。但是“反革命”的行径性质是相近的。（一川，2012：138）

³⁰ 属于“二区”，隶属马列派张忠民。

她夙夜思想着如何在生孩子和打游击之间作抉择（金枝芒，2008：61）玉兰的心理反应，邱依虹也有记载，一名叫翠红的马共女性，回忆自己在森林里产子的经历：

“我没有太想我的儿子，在我们那种环境下，怀孕就像是被诅咒似的，又好像得了一种病，而不是一种福气，我很担心会因为怀孕而被批评。”（邱依虹，2004：132）

这种忧虑又如玉兰的内心独白一般：

“她想起了自己的身孕，又不能不深感忧虑了。困难来了，要摸群众，要爬集中营，怀着孩子多么不方便…不能带着一个哇哇哭的孩子打游击。她柔肠绞结，一时解不开来…她有时甚至想找一些青草药吃…她又害怕自己也弄成那样，不只一生受苦，也不能好好为党工作，给组织带个长期的拖累来，终是不敢尝试。”（金枝芒，2008：61-62）

由此可见在作为母亲护子和掩护组织行进之间无疑是很大的挣扎，然而在此队伍中任何人的生命都很宝贵。辗转到了第43节，就是玉兰在营房生产的过程了，这时面对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生下孩子后，该怎么办？³¹孩子终究是无辜的，几个大人实在下不了毒手。但是迫于可能被敌人追歼的危险还是被迫处死他。大人们哭成了一团，却无可奈何。金枝芒本身经历新生儿早夭的痛，青草药也带给他丧母的记忆，他将这种领悟融入其中，这也许是他引读者深思的地方——为了革命，孩子的命不是命吗？孩子在故事中是被革命的，还没看清世界就被迫处死，即使盖上党旗也无济于事。

³¹ 一般除了处死，就是送给民运同志或共产党控制的村落的村民去抚养。可参见波澜《葵山英姿》（波澜，2015：274-281）

2.3 现象二：故事情节与真实记载的对比参照

2.3.1 恐怖的一瞬间



图二、英军士兵及受害者的头颅³²

值得一提的是张福和刘芳充战死后的结局在现实中可以找到原型，战时的血腥恐怖尽凝固于一张照片，英军士兵提着一对男女的头颅当作战利品拍照。许多专著均有引用且论述这张照片³³。猎首用于对付马共的游击战还是相当凑效的，主要是可以辨认身份。《饥饿》中如此描述：

“张福和刘芳牺牲了，红毛兵砍下他们的头颅，回到集中营的栅门口，第一件事情，为了给老家伦敦寄回一种他们视为值得夸耀的证据，拍起照来。”

（金枝芒，2008：232）

³² 转引自陈平（2004）《我方的历史》页 271-277

³³ 如陈平《我方的历史》（2004：271-277）、雷子健《谁杀了钦差大臣？》（2014：177-178）

由此可见，英军此举也可以引起更多的马共分子拿着上级的首级来投降。

2.3.2 生理和心理的局限

《饥饿》顾名思义就是要“找吃”、“充饥”。“饿毙政策”证明饥饿比战争的刀剑还恐怖。陈平提及新村计划对马共的打击是渐进式的，他说道一支 30 人规模的游击队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以来森林的天然营养维生超过两个星期。（陈平，2004：239）要想让部队运作下去，唯有缩小部队的编制。新村计划也阻断了民运网络和马共的联系，所以马共无法取得情报和食物。进而出现粮食危机，当马共不愿坐以待毙时，就会选择突围，突围也可能给叛徒下山投降、引来英军追歼的机会。

饥饿的惨状，主要是对生理的折磨，书中写挨饿的惨状，孕妇、甚至壮丁都无法幸免。金枝芒写玉兰：

“丰满的肌肉瘦削了，红润的脸容蜡黄了，灵活的明眸像注水一样呆滞，发亮的黑发像乱草一样蓬松；胸脯瘪了下去，四肢瘦小了下来；一个高大相称的健壮的身体变得又细又长，高高的肚子像是一条什么细长的东西上面颤巍巍地突出着。”（金枝芒，2008：249）

写挨饿中的孕妇，画面是震撼的，这里有其可以勾起战士对英帝的仇恨，但是也注入金枝芒的同情。

此外即使是壮丁也无法幸免，金枝芒写阿冬和林婶见面的那一刻：

“阿冬饿得瘦骨嶙峋，不高的个子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吃了成十天盐，肿差不多消了，露出一付皮包骨头的面孔：颧骨高高地突起来，面颊深深地瘪下去；在出

奇地阔大和深沉的眼眶里，不眠的眼珠布满了血丝；黄蜡色的脸庞泛着苍白，嘴唇却是墨一样的紫色。”（金枝芒，2008：198）

可见“饥饿”是可怕的武器，而突围成了唯一的活路。金枝芒借由营造各种饥饿的恐怖才能进一步塑造战士的心理反应，如透过蛮仔这位少年的口中说出：

“我想不到打游击这样苦，我以为革命只要舍得自己的生命同敌人拼就得了。可是艰苦的日子才开头，我就觉得这样苦了。...但肚子饿得太厉害，连野菜都没得吃，我觉得太苦了！”（金枝芒，2008：91）

金枝芒由此定位了一名在这饥饿当中呐喊的少年。此外，金枝芒也表示叛徒明富也是饿坏了才来投奔老刘的（金枝芒，2008：33）。从各种生理的惨状写到心理的挣扎，是小说的可观之处，如老刘期许扭转颓势（金枝芒，2008：35），当饥饿逐步吞噬队伍之际，字里行间，已经可以让人想象老刘内心的挣扎。所以在《饥饿》中透过写生理局限和心理局限来互补，勾勒出时人的内心反应。



图三、马共游击队中的少年³⁴

³⁴ 转引自 Leftenan Kolonel (B) Baharudin Bin Tassim. (2011) *Tentera Darat Menentang Insurgensi Komunis 1968-1989*. Malaysia: Makas Tentera Darat. P10-11.

第三节、小结：溃灭与重生

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先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漠，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想着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

（鲁迅，2008：415）

好的革命文学先是从“失败主义”开始，才能真正体现革命的溃灭和新生，一如最后成功突围的五个人。从马共队员素质来看，的确是不完美，乌合之众，然而完美的写实主义原自于它的不完美。金枝芒凝固了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然而交战双方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学到教训。

第三章 驼铃：再现国内革命战争（1961-1989）

第一节、“文史互见”与“抢救记忆”

驼铃本名彭龙飞，1936 年生于霹雳曼绒。是本论文中唯一不具共党身份的“局内人”。驼铃的表叔—杜龙山³⁵，是马共抗日时期的烈士。驼铃毕业于实兆远南华中学，这是陈平、应敏钦等马共领导人的启蒙温床。1974 年，驼铃因同情一名解阵成员而遭株连，被关进甘文丁扣留营。四年铁窗是驼铃思想的又一转变时期。（驼铃、陈剑，2013：78）从杜龙山兄弟被杀、被驱逐，这些记忆让驼铃意识到他的生命和这段惨痛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是故他决定以文学抢救历史和记忆的原因³⁶。远离了斗争的现实，他可以畅所欲言。

从访谈中得知他的文学之路承鲁迅和茅盾³⁷的启发。鲁迅曾说阿 Q 的子孙最没有记性，十分健忘（钱理群，2011：40）驼铃最担心马共的史料为世人所遗忘，尤其强权的强迫遗忘，故冒着被捕的危险探访和平村。茅盾的写实主义则是为历史编剧（王德威，2011：40-41），如《三国演义》是编剧自《三国志》，在历史

³⁵ 又名赖来福，1922 年生于霹雳实兆远。1937 年上南华中学。1939 年加入马共。1940 年任霹雳州南区区委委员，1941 年领导锡矿工人运动。同年被捕，12 月 20 日获释，前往“101 特别训练学校”受训。任“二独”队长。1943 年被日军抓捕，处以斩刑。（原不二夫，1998：43）

³⁶ 补充：如《硝烟散尽时》（1995）的后记所述：“《硝烟散尽时》纯粹是我——一个那种时代的经历者——的文学创作，全然无意借此褒贬任何一方。人的视野和思想，难免受生活环境的局限和时代潮流的影响。是非功过，一切都有待后人评定。正直的人，经得起挫败，也受得了寂寞。他们不会希冀旁人的怜悯与安慰。..那浓烈的血腥味，的确令人恶心。不过，人类也因此逐渐觉醒，逐渐懂得与其相互杀伐，不如共同建设。我相信：黠武者终必孤立，什么仗也打出起来。”（驼铃，1995：146）

³⁷ 笔者认为，驼铃的写作风格与茅盾相近，重视史料学的中心地位，叙史者与虚构者之间即便不是相同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王德威，2011：33-34）

（学术）的骨架上去建构文学（艺术）的血肉，《寂寞行者》³⁸则是马共历史的演义。小说不能当着正史来看，但可以拯救单调的历史叙事，其“作者也允许自行设计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事情和情节”（驼铃、陈剑，2013：83）从而延伸出作者有意以文学来抢救记忆、植入个人批判的用意。

选择驼铃作为论述对象，正是由于马共是仍然编不出党史的共产党（黄锦树，2013：303）³⁹。今天所见零散的文献⁴⁰都只能呈现局部的历史，《寂》⁴¹则似项链一样把各类散乱的珍珠（文献）串联起来，尽管是文学，却也成功把这半世纪的历史给串联起来。

驼铃并无“创作”可言，他的作品，完全取材自各类文献和自己的实地考察。驼铃被潘婉明认为是“抄写历史”、“喃喃自语”，却也真实地反映了马共内部的复杂性（潘婉明，2011：462），黄锦树认为此现象在马共研究史上就意义非凡了（黄锦树，2015：164-165）。因为这样反而突显作家的自觉和历史的真实。

³⁸ 下称《寂》

³⁹ 详见潘婉明《马来亚共产党—历史、文献与文学》（黄锦树，2013：303-331）

⁴⁰ 回忆录、专著、文集等。

⁴¹ 另一作用是作者用文学追溯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驼铃、陈剑，2013：77）

第二节、《寂寞行者》所勾勒的历史之人、事、物

3.2.1 肃反：寻找经典

“如果用《饥饿》般的手法，下一部马共内部的经典应该叫《肃反》。然而没有。”

（黄锦树，2015：354）

这是黄锦树对于其“马共四部曲”的观点，马共书写“经典缺席”的现象当属《肃反》，其重要性在于其可以反思马共的内部暴力，黄锦树给潘婉明的眉批莫过于说明驼铃的重要性，就是他揭示了马共内外的复杂度（包括肃反）。（黄锦树，2015：164）黄锦树以贺巾为例：贺巾写肃反的篇幅不长，属于“温和的抱怨”（黄锦树，2015：357），黄锦树所反映的问题是无论小说能否成为经典，但有涉猎肃反的情节，仍可以透过考究其“史学价值”来确认其成为经典的资格。故驼铃的肃反主题，即使跨度不长也可以填补经典的空缺。

自 1955 年和谈破裂，到 1957 年开始执行“退伍政策”再到 1961 年颁布《新方针》，共有近六年的过渡期。驼铃的写作忠于一个史实，即中苏分歧对马共的路线之争有着一定影响⁴²。综合陈平、阿成的回忆录，此时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一直在观望莫斯科和北京的指示，对于“退伍政策”有反悔的认知。

⁴² 笔者按：1956 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核心召开苏共“二十大”，阿海作为马共驻华代表，出席大会。“二十大”对此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有其深远的影响。大会上列举两大要点：一、各国马列党派可以进行和平（议会）抗争（peaceful transition）、二、否定武装革命的必要性。（War was not a fatalistic inevitability）（A.Chin, 1994: 191）当武装革命不再为第三国际主要考虑，马共开始面对中共和苏共间的抉择。事实上，实行“退伍政策”的那些年，也不仅仅是盘踞在泰南的马共下层前景未卜，即使身在中国的马共高层更是进退两难，马共和中共的党际交流较其和苏共还来得密切，是故中共成为了她的最后希望。赫鲁晓夫核心的决议，让共产阵营霍然揭开了锅，尤其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除了让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六神无主，更是让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如坐针毡。毛泽东于中

自《新方针》⁴³施行后，许多年轻人陆续到边区响应革命，然而尾随而来的暗杀、军事失利和集体中毒，开始引起全军的恐惧，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间接影响着马共领导层，权力让人腐蚀，尤其处在边区，虽然时有冲突，但基本上马共没有“天敌”⁴⁴。故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割据聚落。

集体中毒事件绝对是恐惧的主要来源，也是领导铲除异己的杀手锏⁴⁵。驼铃将中央派和马列派、革命派的主张串联在一起，构筑了这场集体疯狂的恐怖暗夜。“落索”意即把嫌疑人双手反绑，不招认就处死，招认则扩大株连范围（阿成，2009：285）。“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成为当时的恐怖宣传⁴⁶，一来内部不知外界，也担心被渗透，所以“肃反”刚开始是有其“正当性”，但是到了后期，人人自危，形同人

共“八大”发言：“这把刀子（斯大林）不是借出去的，而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没有像那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1977：322）由此可见，苏联敦促共产阵营放弃武装斗争，对于大多靠“打天下”起家的共产党都是个潜在威胁。故随后的“五七体制”、“肃反”都接踵而来。沿着这样的历史轨迹，马共是无法置身事外的。毛泽东相信“大乱才能大治”（阿成，2009：87），也为了争夺亚洲革命的主导权，毛擅长权术，是故他肯定马共的斗争，也支持他们继续斗争，早在1954年，毛就说过：“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向敌人缴枪投降，一辈子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呀！”（阿成，2007：105）后来参加中共“八大”更是让小章和阿海五盘形势，因为会上毛泽东痛批“苏修”。而且毛泽东否定中苏《联合意见书》里关于敦促马共放弃武装斗争的“建议”（阿成，2009：85-86）制造了马来亚革命形势太好的假象。

⁴³ 笔者按：1960年代，亚、非、拉各地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陈平党中央得到了中共和越共的支持，准备“重整旗鼓、放手大干”（方山，2005：118）。1962年，马共公布《新方针》，内容包括：“巩固内部、发动群众、利用矛盾”（方山，2004：119-120）三大要点。另一种说法：“偃旗息鼓、发动群众、麻痹敌人...（所谓“麻痹敌人”，就是舍得花钱给泰方各级官员送礼！笼络他们，减少斗争中的阻力）。”（全仲仁，1998：7）

⁴⁴ 笔者按：马共根据《新方针》中“利用矛盾”的原则，在边区肃清土匪（凌云仔、中国国民党残部）、镇压分离主义、维持治安，让所在地——勿洞成为泰国安全指数较高的城市。虽然时有和军警交战，但更多时候是“假交火”（足印丛书编委会编，2014：36-37）。可见马军无法跨境剿共，泰军顾及民意和自身利益，也少有进犯，所以谓马共没有“天敌”是再贴切不过的。

⁴⁵ 笔者按：在此封闭的环境下，当“共同利益”（Common purpose）（殷海光，2013：71）受到了损害，“集体主义者”即领导集团可以依靠一个单独的目标来规定成员的一切活动。领导集团认为此一秩序是完备到他们可以掌握极大的决定权。要达到这种局面，首先要“假定有一个完备的伦理法典存在”（殷海光，2013：72）。这套法典便是领导集团有权“肃反”、“锄奸”，较知名的事件就是阿秀借整肃医务人员来达到自己的专制，一来借口自己肚子疼，且在害怕集体中毒的“群众基础”上达到目的。

⁴⁶ 笔者按：从提出口号到将暴力付诸现实，迎合了“盗匪行径”（gangsterism）（Hannah Arendt，1983：84）

畜（Human Cattle）⁴⁷，因被关押在大课堂的同志，个个像“待宰的鸭子”（驼铃，2011：405）。

故事先从五分营房的缴械开始⁴⁸，受害人秀菊⁴⁹（秋菊）是医务员⁵⁰，在此主导“肃反”的包括阿石、亚平、阿良⁵¹等人。亚平和阿良轮流逼供，秋菊在经不起考验的情况下编造故事，本来说自己是忠诚的党员，后来改口说自己和政府有联系，还供出了一些人。杜志超（C.C.Too）是当时主导心理战的人物，他让人编写的《我要活下去》固然有其虚实的争议（方山，2005：151），毕竟是为了瓦解马共斗志而作。驼铃借秋菊写道：“妈，可怜的妈，女儿错了。这儿的确像个黑糊糊的大泥潭，非大勇大智者，永远无法跳出去。”（驼铃，2011：401）亚平借“肃反”垂涎女色是后来才被查实的，这点却也呼应了《我要活下去》的立场⁵²，驼铃将各种史料巧妙联系在一起。秋菊的丈夫老陈，如野猪一样抬出来，毫无尊严，她的好姐妹，春兰因不堪逼供而精神失常，大骂：“魔鬼！你们都是魔鬼！...世间没有鬼呀！如果有鬼，你们也不敢这样无法无天。”（驼铃，2011：406）可见共产党的宗教性质和周期性“肃反”对党员的戕害，也只有作家局内人能以此等张力引人深思。这次肃反在五分营房处死了石头和他的两个孩子小海和小洋，少光 and 福申，古宁和余杰（自杀）（方山，2005：150）等，都是真有其人的。

⁴⁷ 殷海光语。（殷海光，2013：71）

⁴⁸ 笔者按：和梁秀莲的回忆相似。（杨立新，2015：178）

⁴⁹ 笔者按：人物原型可能是《我要活下去》的秀兰。

⁵⁰ 笔者按：医务员是随时可能被押出来祭旗的，因为处在集体中毒的阴影下，只要领导人肚子痛就可以拿医务员开刀，制造的冤案，牵连甚广。

⁵¹ 笔者按：亚平，即艾平，后来和阿良难逃被处决的命运，别人头者，人且剔之。后来有三人不获平反，除了他们还有林锐。

⁵² 详见《我要活下去——一个前女共产党员为党斗争的惨痛教训》页 5-8 可见抄写的痕迹。

驼铃借张佐之口道：

“多疑的独夫！要是曹阿瞒地下有知，也要自叹不如。”

（驼铃，2011：410）

以此来表达驼铃对肃反的疑惑与愤慨，更贴切说是惋惜。进而说明象屿仔（一江）和阿达、阿典和求真乘机另立山头一来是自保，二来也顺道借势铲除异己⁵³。1967年至1970年的“肃反扩大化”，杀、杀、杀，包括资深领导 Arifin（伍天旺）也沦为冤魂，但是驼铃的抄写历史，主要是参考中央派的立场⁵⁴，这也许是要追究中央派的责任，据史料载，除了艾平和阿良，另一对嗜杀成性的领导夫妇就是阿苏和阿秀，借势大搞个人崇拜，下山后，营盘散落着他们的合照（海凡，2014：177）可见众人对他们的憎恨。驼铃对于张佐是深切关注和同情的，驼铃大量借张佐的视角来批判这场闹剧，张佐的内心独白更让张佐比权术家更有革命家的品格，张佐反思：

“既丰衣足食...敌人对我们又鞭长莫及，应是有所作为的时候，偏偏捕风捉影，什么锄奸肃反，无事生事。...中国文革是公开批斗，我们这里却是关在地洞里密审。”

（驼铃，2011：412-413）

⁵³ 笔者按：阿达，即全仲仁，有一名著《马共内部风暴》，记叙了八支进行反“肃反”（八支称之为“黑肃反”）的斗争，一般中央派的论述里，都以八支制造9人“敌奸”、二区制造5人“敌奸”被处决的案子铲除异己，再另立山头，但是阿达的论述里，以八支身不由己，被迫让中央代表阿焰和阿和掌握审判权。即使是张忠民的战友——蔡求真的回忆录《四十年游击战争生活回忆录》也同要表示为了能让阿和看到二区的忠诚，被迫处决一部分人以保全大多数。

⁵⁴ 笔者按：因自保而脱胎的马列派、革命派是不获中央派承认的。

一语戳破这场荒唐剧，也延伸出共产党的宿命，笔者以为或许借高华的“‘肃反’情结”论⁵⁵，以“延安整风”为例，可以解释这没规律性的现象，主要一来是领导集团对党内敌情过度估计、二是出于其个人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高华如此说：

“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径庭：所发现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次甄别和抚恤的工作。（但为了维护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

（高华，2015：466），

虽然高华写的是中共，但因同是共产党的属性作祟，马共的发展轨迹与其何其相似。笔者以为这需要领导的权威和部下的恐惧心理相辅相成。马共是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捕风捉影，制造了这场悲剧。

3.2.2 地下组织

〈老虎山下〉抄写自马共 1970 年代的历史。小说中的阿良是一名地下组织——“解阵”⁵⁶的成员。其故事放在卷首，说明驼铃志在为“那些不计是否被领袖认可的理想社会追求者”的理念。解阵成员所执行的任务是最前线的，也是最危险的。阿良和

⁵⁵ 高华：“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的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华，2015：466-467）

⁵⁶ 全名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由蔡健福、蔡忠龙等人于 1968 年组建，1969 年和“第十二支突击队”取得联系。成员主要由前左翼政党的成员再放弃宪制斗争后，转而支持“解阵”。据相关简章载，其奉行“民主集中制”（南军，2014：403）故阿良是被驼铃所关注的异类。解阵为突击队提供人力和运筹的工作。更多解阵内容，详见南军回忆录——《迈步征程》。

阿光第一次出任务是要刺杀探员“黑鬼昌”⁵⁷，任务失败，阿光被捕，阿良逃命。阿良的内心是恐惧、荒凉的。阿良一直思考自己有否革命资格。因为蓝天曾经指导他革命不可以有温情主义。以至于他竟然会因为利用三通而愧疚。他察觉到这家人已经融入了社会，自己的革命理想，确实太遥远。阿良想上队，为求自保，但是也不够资格，主要还是因为武装同志仍然需要有人负责地下工作。阿良不愿暴力革命、悖逆自己的良知，却又对新世界报有一丝幻想，这正是个人的精神思想史，复杂、矛盾。本章节中，许多情节，如整个组织瓦解、领袖被击毙、插红旗、缴获解阵刊物都和何启才的整理十分相似（何启才，2011：34）。驼铃当年也是因解阵而获罪，故他也特别关心解阵鲜为人知的历史。最后，阿良选择自首，他是一名失败的共产党人，但至少赢回良知。

3.2.3 张佐⁵⁸

在驼铃笔下，张佐是全书唯一具有崇高“革命品格”的共产党人。驼铃写他如何拥抱理想、如何尝尽各种革命的苦涩，目的是要表达尽管张佐最后输了，却赢得了尊重。张佐南下作战期间，靠解阵、新青盟等地下组织和山区群众支援，尽管仍

⁵⁷ 笔者按：1974年警官 Tan Sri Koo Chong Kong 被刺杀，涉案人是 Ng Fu Nam 和 Lam Mun Cheong. (A. Chin, 1994: 236)

⁵⁸ 笔者按：张佐原为“五突”领导，后和“六突”的南一互换岗位，从此，张佐——“六突”成为南下突击队的明星，战果丰硕、孤军深入至彭亨的劳勿，战斗持续时间最长（1973-1988）。在《山林岁月》里，张佐成为故事的主线，也是驼铃最为关注的人。在驼铃眼中，张佐非圣人，却没有迷失共运的大方向。不失为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驼铃，陈剑，2013：79）张佐在1988年因叛徒出卖而被俘，进而才有了后来和平协议的处理模式。

然很难打开局面，但是已经深入吉隆坡附近了⁵⁹。故驼铃眼中那些窝在北马局的“衮衮诸公”实在没有资格认为张佐是叛徒。因为张佐挥军南下，正是远离了肃反的酱缸⁶⁰，作一名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驼铃以一名老百姓的立场，故他的立场还算是“旁观者清”的，若马西共出山和解是“投降”、张佐被捕是“被诱捕”⁶¹，怎么中央派就是“和解”了呢？这正是驼铃认为内外都对张佐不公平的地方，凭什么两千人的部队在北部偏安（驼铃、陈剑，2013：82），而南下回来的最后只有约两百人（何启才，2015：104）？

驼铃不愿张佐的回忆录被时代潮流所湮没，故把张佐在 1973 年南下的事迹，改写成日记，是为了更贴近当时张佐的心境。由于张佐删除掉其中两篇最重要的章节，主要是张佐被捕到和政府谈判的事迹。故驼铃才把他所知的写进去。何启才整理出马共突击队南下的三大影响，包括“延续马共武装斗争的历史、提供马共武装斗争的动力、加强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地位。”（何启才，2015：105-106）从中得知，孤军深入的张佐完成了前者，却也造就了后者。不以成败论历史，张佐确实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更何况威权政体也为他的斗争提供了动力，让战况成胶着状态，才有了后来的和解。

⁵⁹ 部分马共文件认为，是由于张佐无法打开局面，故萌生身先士卒的念头。此说法仍然待查。（方山，2005：26）

⁶⁰ 笔者按：张佐之于马共，犹如石达开之于洪、杨。

⁶¹ 笔者按：相关的口述是表示部队同志都接到张佐的亲笔信，然后到指定地点等接头，然后被诱捕。（方山，2005：65）先是张佐于 1988 年 3 月 2 日被捕，此后丛林中的 70-80 人残部被诱捕。

第三节、马来马共

“‘族群—宗教’形成马来马共或马共历史论述最大的内在制约....擅以‘总体化’来遮盖马共之间的多元差异，并以族群因素来判别反抗运动的正当性，过度明显的敌我关系，使历史叙述有所偏差或不符合史实。”

（魏月萍，2011：19）

魏月萍所著的《马来马共的历史论述与制约》道出了主流社会对于马共历史，尤其族群成分有“总体化”的认知偏差，主要是如黄锦树所言：“马共=华人”的印象。驼铃的作品有其“以文述史”以“抢救记忆”的作用，让笔者感到惊喜的地方莫过于驼铃提及了近乎被淡忘的历史——“马来马共”⁶²及其起源。难得的是华人作家抢救马来马共的记忆。

《寂寞行者》的〈卷三·山林岁月〉第 11 至 14 节，可见作者“抄写”《阿都拉·西·迪回忆录》的痕迹。马来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尤其左翼所主导的运动，更是和马来群岛——印尼的反殖斗争联合在一起⁶³。第 11 节起，马来青年联盟⁶⁴走到分

⁶² 笔者按：和平下山后，有一部针对马来马共“三巨头”的访谈，名为《伊斯兰·马来人·共产党》，由此可见，马来人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当时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等运动相结合。当时的马来人，尤其有受教育的一群，他们透过西式教育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唯物主义的共产党如何为穆斯林所接纳？《比较的幽灵》提及印尼共（PKI）号称拥有两千万党员（安德森，2012：368），魏月萍以此为例，印尼共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共产党，而印尼人口近 85%是穆斯林。阿都拉熟知马来民族的历史，也用了马克思的史观来解释之。马来民族对于“大马来由”（Melayu Raya）有一定的想象，尽管被列强分割占领而形成不同的疆域。是故在解释马来人参与马共的历程中有必要爬梳其“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共产主义”三合一的主体思想。左翼马来人首先认定自己是马来人，信仰伊斯兰，再以共产主义运动展开他们的斗争，一是为了马来人的解放、二是将共运视为“圣战”（Jihad）（游砾译，2007：13）。所以共产主义是实现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途径（Method）。

⁶³ 阿都拉·西·迪：“来自同一个马来族，同在一个马来世界”（阿都拉·西·迪 2008：130）

⁶⁴ Kesatuan Melayu Muda, KMM

崩离析的窘境。此章节的主角正是马共主席、第十支队创建者——阿都拉·西·迪⁶⁵。

KMM 本来期许和日军合作以争取独立，然而事与愿违，日本侵略者于 1942 年 6 月解散该组织。理想幻灭，促使阿都拉和同代人一样，选择转入地下，进而武装斗争（M.S. Lamry, 2007: 46）。

第 11 节的跨度相当急凑，先从阿都拉《马来亚明灯报》（*Pelita Malaya*）记者时期开始、参与各种宪制斗争，到进行武装斗争，他于 1948 年在淡马鲁组建第十支队，是一支纯马来人的马共部队。

从阿都拉·西·迪的革命生涯可以得知，他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从马来青年同盟到马来国民党）与共产主义（马共）合流的“纳萨贡”（NASAKOM）典型，青年时期，受印尼共革命启发，阅读过丹·马六甲的著作，和阿里明有过接触，和陈平蒙毛著启发是相似的。文中提及他在淡马鲁组建解放军第十支队，说明马来马共具备华人马共所欠缺的优势，基于彭亨的地缘性优势⁶⁶，马来马共可以更有效地动员群众，且得到群众的掩护，文中提及一名收留阿都拉的村民，原先是 KMM 的支持者，后来选择支援马共抗英的革命，无非只是政治信仰的转换而已，因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驱逐英政府。在群众掩护下，在数次伏击战中重创英军⁶⁷，且能瞒天过海转移大队，这正是马来群众和阿沙群众的掩护所得之成果（阿布·沙玛，114-120）。是华人马共未能及的。文中所见的伊斯兰问候语，说明马来马共仍然以马来人、穆斯林自居，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是政教分离的，和平后，阿都拉和他

⁶⁵ 阿都拉·西·迪，1923 年生于霹雳，祖籍苏门答腊，毕业于霹雳江沙马来学院，熟知马来民族历史（代表作：《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尤其关注霹雳地区的马来族起义历史。1939 年参加马来青年联盟。1945 年加入共产党。

⁶⁶ 详见 Mohamed Salleh Lamry 著《第十支队斗争史》

⁶⁷ 武吉尖不辣（Bukit Cempedak）战役、真若路（Chenor）战役。（应敏钦，2005: 37-40）

的战友还结伴前往麦加朝圣（拉昔·迈丁，2006：89），在当时参加共产党更多时候是为了以此为途径而已，是民族主义的延伸，如阿布·沙玛是巴哈曼的后代（阿布·沙玛，2005：6-8），他视马共革命为实现马来民族自主的途径和使命。



图四、阿都拉·西·迪夫妇与陈平夫妇⁶⁸

⁶⁸转引自文羽山（2017），《路漫漫——陈平北上历程》页 132。

第四节、小结：回顾与反思

综合以上的介绍与探讨，驼铃并无“创作”，亦无所谓“喃喃自语”，而是巴赫金提出小说中的杂语。如《寂寞行者》所见的各种第一人称，各说各话正是作者思想和评价意向的载体。（巴赫金，2009：61）杂语中的说话人一般是具有重要社会性的人，有独特的性格，如张佐、又似个思想家，他的话是作者思想的载体，但谢天霖才是驼铃以自身为原型塑造的另一角色⁶⁹。无论是《硝烟散尽时》（1995）还是后来的《寂寞行者》（2006）都作于马共和解后的年代，说明此刻的驼铃已经远离了昔日“火红岁月”的现实环境，他可以据有“局内人”的优势，当一名“创作者”畅所欲言：

“因为觉得小说的包容量大，不但可以深入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全面反映一个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还可以引导读者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从容思考。”

（驼铃，2012：iv）

从著作中投射出来的驼铃是一名思想家，懂得用写作引导读者思考，基于人文关怀的出发点，他对记忆的钩沉贡献，使得他自成“一家之言”。

⁶⁹ 主要是〈扣留营里〉的“所见所闻”。

第四章 海凡：最后的马共心曲（1976-1990）

（旧作）今日得以面世，感觉似藏粮出土。当然，作用无法与藏粮相比，竟有如斯恍惚，也许在于它们的旧、昨日、营养大幅流失而尚能充饥…。

（海凡，2014：5）

第一节、以“潜在书写”检视“心史”

海凡，1953 年生于新加坡⁷⁰。1976 年上队，为第七期学习班学员⁷¹，隶属解放军 12 支 3 中 11 小队。70 年代上队者，军龄较轻⁷²。进入 1970 年代，政治气候风起云涌。海凡原参与文团活动，亦属马共地下成员，因一次内政部抄家而开始长达 13 年的流亡、革命生涯。

⁷⁰ 笔者按：新籍马共投身马来（西）亚的革命运动，是由于两地民族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简言之，他们主张和马来亚统一，反对由英国参与主导的“马来西亚”计划。“马来亚意识”、新加坡建国史上连串的大逮捕（“五·一三”、“冷藏行动”）都是主要因素（详见相关专著，本文不详述）。余柱业等人属于“马来亚意识”的代表人物（林恩河，2017：75），余曾参与马来亚民主同盟、黄信芳本来是行动党人，也是“星抗盟”的成员，方壮壁曾是左翼报章记者，于 1957 年出走印尼。沿着这些线索，新籍马共的革命生涯，一是国族认同、二是寻机施展政治抱负、三是逃离政治迫害，国族认同和政治信仰是主要动力。另外，在马共党校的相关文件也有提及：“新加坡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方山，2005：188）也认为“大马来西亚”计划（Gagasan Malaysia Raya）是“新殖民主义”的延伸（方山，2005：47），不予承认。从各类文献可以得知，新籍马共，尤其海凡那个世代参加共运，正是出于透过革命建立一体的理想召唤，是一种“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现象（安德森，2010：172）。

⁷¹ 详见《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第七期学习班共计 66 人，以城市青年居多，工农出身者次之。大多经突击队、地下组织上队。营房为原“五分”营房，后改编为“三中”，即海凡所隶属的单位。到 1977 年止，马共所办之学习班，共办了八期。（方山，2005：78-79）

⁷² 海凡将之分为：“老同志”（抗日军）、“半新老同志”（抗英军）、“新同志”（70 年代上队），“新同志”即军龄较轻的新兵。（海凡，2014：153）他们属于较为特殊的世代，大多不熟悉以前领导集团间的倾轧、或不敢提及“肃反”的历史。

《雨林告诉你》⁷³概括了马共战士的心路历程。其史学价值在于作者的视角与其可探讨共产党性质的功能。共产党是奉行集体主义的革命党，但海凡的日记中不乏对“群己”关系的思索。马共内部的肃反血泪、马新政府的白色恐怖，钳制了个人的思想。即便海凡的个人空间被挤压，却仍独立思考与创作。这些作品受当时环境的限制一直没发表，这种现象称为“潜在写作”⁷⁴。

无论在部队里或下山后，海凡延续现实主义书写“此时此地”的传统，参照夏济安的说法，就是把共产党员当人看，因为：“…除了搞政治，他们（共产党人）同样也有思考的能力。”（夏济安，2016：xxx）故即便个人空间被挤压，却仍有独立的思考与批判。海凡对于人物的描写十分细腻，也把自己的批判与同情融入其中，不失为“软心肠”⁷⁵的共产党人。夏济安以翟秋白《赤都心史》中的“两元化的人格”为例，从而说明共产主义者也存在分裂的人格（夏济安，2016：8），如海凡日记里有革命者的激情，也有悲悯革命者境遇的悲恸。

《雨》收录了面世第一版的作品，包括了小说和日记（散文），海凡的日记除了记事，也有抒情、议论等特质，故归类为散文是实至名归的。小说的创作年代介于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此一时期马共的斗争仍在持续。所以处于战争状态下

⁷³ 下称《雨》

⁷⁴ 笔者按：“潜在写作”即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并没停止创作，然而其作品在客观环境的限制下不得公开发表。主要分为自觉和不自觉两种类作品（陈思和，2003：66）。“潜在写作”的概念最初用于解释文革时期的创作现象。马共 40 年革命中不乏此文类，除了党务文件，便是被党内刊物拒于门外的部分作品、也有来不及发表或从未想过发表、仅是作者孤芳自赏的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更贴近作者的思想，尤其在解读马共成员的内心变化方面，它提供了重要参照。

⁷⁵ 夏济安以翟秋白为例。

⁷⁶，许多作品都须符合鼓舞士气才得以发表，又或者作者只是为了抒发情感而作，故从年份来推测，这些作品在写成后均被收藏了一段时间才重见天日。从修订年份来看不乏后来修增的现象，如〈她们之：姐妹〉是〈她们之：保姆〉的前传。对照小说和日记，不难看出其间的联系，因为许多人物在现实中均有原型。若沿着这些线索，可见海凡对改编现实十分重视这些细节的感性呈现，这符合写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动人感”（affectivity）（王德威，2011：3）在潘婉明看来，海凡笔下的人物是具人性化的人物⁷⁷。钱理群提及著史的“文学性”品格，一是“注意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其二则是注意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剖析，即首先要关注个人和心灵进而到历史（钱理群，2012：350）。海凡当然不是著史，而小说却有“以文述史”的功能。而海凡对于这些人物的命运是洞察甚微的（海凡，2014：167）由此可见他可以补史之阙的地方，正是他写这些人物大都从细节入手。当年未发表，也许是要将更多的个体关注结果和自身的经历融入其中。

日记篇则更为贴近真实的正史，而小人物的言论则代表了个体心灵的回应，日记是私人的写作，是不公开的，所以日记的立场固然是偏主观。对于日记的价值，余英时表示，作者兼具“过来人”身份的日记具备“主客体交融”的优势（余英时，2010：523-524），而日记也是“潜在写作”的一种文类。陈思和认为日记属于不自觉的创作（陈思和，2002：65），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日记的主观性质。重要的是至今为止的马共成员回忆录大多集中在谈“回忆”，是陈年往事。而海凡的

⁷⁶ 此时正值“20个月反围剿”时期：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军警（主攻军力3千）对盘踞马泰边区的马共十二支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历时20个月，两败俱伤。（宏胜，2013：148）

⁷⁷ 潘婉明（2015）政治不正确与文学性：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抄自：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228/>

日记则更为贴近“此时此地”尤其从中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1990 年的上半年，浓缩了最后一批马共对于理想幻灭和前景不明的焦虑感。海凡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写下了前人鲜少触及的题材：暮年的陈平及其党中央、“叛徒”马西共、“自绝于革命”者、集体主义的崩解等。海凡记载了这段理想幻灭的心史。日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史互见的现象远高于小说，是故下节将集中于探讨日记内容。

第二节、“过来人”的日记

海凡的日记写于 1990 年 1 月至 4 月间，记载了协议签署后，从建村到亲人探亲的此一过程，包括记录了自己对各类观察对象的个人见解。海凡日记的史学价值在于他是少有记载—1990 年上半年部队事迹的一人（尤其内心变化）。当马共不再是革命者，可在协议保障下选择解甲归田、入籍新、马、泰三国安居乐业，他们该如何面对一个已经失去历史使命的前景？而此刻的集体焦虑是值得关注的。

马共下山后，曾经涌现一股“回忆录风潮”，主要的目的除了反思历史，也有为自己正名的诉求，据钟怡雯的介绍，以方壮壁为例，他的回忆录是应《李光耀回忆录》而生（陈思和，2014：81-89）。回忆录较多着重于谈及过去，鲜少着墨于当时和对未来的设想（包括焦虑），回忆录的主观性质和日记的主观性质不同，前者偏向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代表了组织），后者则是最私人的产物，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想畅所欲言。日记最能表现“此时此地”和作者的“一家之言”。作为“潜在书写”，起初并没有想发表的念头，仅仅是“想留下在这段风雨泥泞的路上跋涉的足迹。”（海凡，2014：121）仅想以日记记下他人生中的一重要时期。海凡只是一名小兵，无权过问领导集团的决策与安排，他处于被动地位，他对于前景不明的焦虑，和陈平、阿成等领导集团不同，海凡以一名下层士兵的视角呈现了他眼中的《合艾和平协议》⁷⁸所带来的巨变⁷⁹。

⁷⁸ 下称《协议》

⁷⁹ 1989 年，三方签署了《协议》，换言之，马共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此一时期为海凡人生中的一重要时期。1990 年建村之时，他已经 37 岁了，失去了历史使命，亦无就业前景，部队笼罩着集体焦虑和无力感。笔者将其日记整理为三大部分，以解析 1990 年上半年间，马共成员的集体焦虑。

4.2.1. 小兵的焦虑

落实《协议》内容的过程中，首当其冲是下层士兵。海凡对于现实、前景充满了焦虑⁸⁰。海凡上队 13 年，在日记中不乏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故日记中的这位老马共被还原成和你我一样的凡人。下山建村后，对思念家人⁸¹的情感更为强烈，在日记中不乏他内心的呼唤与自责：“（上山）虽说是出于理想的召唤，但内心对家人仍是深深地抱愧”（海凡，2014：129）由此可见日记能更贴近著者的心境。正是由于海凡自觉有愧于家人，从而延伸出对归国前景的焦虑。另一焦虑的来源则原自于他对“游击山头”以外的世界近乎浑然不知，这无疑给他在适应新环境造成一定的心理障碍。

然而，1989 年的三方协议并不包括新加坡，这无疑让新籍马共面临归途受阻的难题。如海凡所述，李兵作为“全权代表”力争新籍马共回国的权利。后来李光耀于 1992 年回信要求马共成员签署宣誓书与组织切割（方壮壁，2000：67），这为许多新籍马共选择在泰南终老埋下伏笔。因许多人都不愿意接受此类屈辱的条件甘愿选择落户他乡。

马西共成员的窘境对于海凡而言“同是天涯沦落人”（海凡，2014：173）。

作为一名小兵，无权过问组织上的决定，从过去按命令展开军事行动，到当下必须

⁸⁰ “一种时不我予，不容蹉跎的紧迫感，焦躁感深深地煎熬着我们...中年，又几乎是一无所有，却得在此时，在脱节已久而全然陌生及不可知的情境下，去开始安顿未来的生活，内心的彷徨，焦虑，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1月20日（海凡，2014：124）

⁸¹ 笔者按：他的家人于3月9日、10日到和平村探亲，一切情感非笔墨所能形容，血浓于水，共产党人也为骨肉亲情所折服。从海凡的内心转变来看，历史无疑和他开了玩笑，被他认定要革命的政府，如今给予了他的家人安稳的居住、就业环境，而五弟则为新加坡政府服役。有温情也少不了尴尬，这是海凡在他日记中真诚面对的。自己对于山城勿洞的畏缩和弟妹们的洒脱对照出自己与时空的脱节。此外他和其他准备归国的马共一样，亲人带来日常用品，包括阿月带来的英文字典和英文学习材料等，以让他们在此过渡时期可以安顿下来以备回国。

面对组织签订《协议》后的窘境。这份“光荣的和解”也夹杂着各种大历史之于个体的尴尬与无奈。问题的根源仍是“他们的位置”在哪里？新籍成员从 1990 年开始的谈判（李兵负责）到 1992 年获得李光耀回信，这两年内煎熬，此刻已经初见端倪。回家的渴望、归国的焦虑和事关荣辱的抉择（必须和组织切割）都浓缩于此。无论如何，从“和解”的那一刻起，海凡与同志们都被宣判为“历史的遗孤”，1990 年在归国无门的窘境中，归心似箭、理想幻灭煎熬着全军上下。

4.2.2. “不惑之年”的回顾与反思

海凡的笔触也不仅仅感怀自己处境，其日记也不乏对整个“命运共同体”的评述。本章节主要着重于论述海凡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回顾与反思，主要原因有二，一来是海凡是参与者，而他与同志们则是彼此互为镜子的关系。二来则是这个群体，无论地位尊卑，在小兵的日记里都被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因为海凡洞察各类细节，再结合“实地考察”的成果，无论是对部队领导⁸²、红征之死、马西共成员都有较人性化的描写，极具划时代意义，笔者例举陈平和红征作为论述的对象：

陈平：马共图腾

陈平作为最高领导，他主宰着一千多人的浮沉，尽管作为马共核心人物，下层士兵对于他的印象却是模糊的。1990 年 4 月 16 日晚，海凡和家人接到通知——陈平有意和他们会面。据说是由于“亏欠家属太多”所以想接见海凡和家人。在此

⁸² 被孤立的阿石（海凡，2014：134、168-170）、饱受风霜的阿元、阿成、老胜、散落一地的阿苏夫妇合照（海凡，2014：177-178）等细节。

篇日记中，海凡提及陈平向世人亮相的次数共有三次⁸³。他坦诚：“他的神秘，他的讳莫如深，不仅仅是对世人如此，对我们一大批追随者亦是如此。”（海凡，2014：181）由此可见，下层士兵第一次和最高领导人近距离接触，内心是复杂的。此时所见的陈平已经 66 岁，显得有些老态龙钟。此次会面后终于把迷雾一般的领袖看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⁸⁴。笔者相信当海凡和家人见到陈平时（66 岁的老人），心情之复杂，非笔墨所能形容。

陈平作为主导这场运动的人，是非功过也决定了下层士兵在和解后对领导人的评价。海凡肯定陈平为全体同志赢得较体面、有尊严的结局⁸⁵。海凡评价陈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⁸⁶（海凡，2014：184）。无论如何，笔者的分析目的并非有意评价陈平的功过，仅是分析海凡对陈平的评价，那就是陈平在马共最后的斗争里（和谈）保全了所有人。

海凡认为和陈平合照的意义也许是：“对火红青春的一个纪念？是对游记生涯的一个定格？还是对曾影响、主宰过自己命运浮沉的领袖的一个挥别的手势？”（海凡，2014：183）故海凡对于陈平的评价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他尝试清理了陈平和自己的关系，因为他的生命和这段历史纠缠在一起。海凡日记除了描述陈平如何主宰同志们的浮沉、以陈平为首的中央派的功过外，最重要的是将陈平还原成一个人。陈

⁸³ 1945 年、1955 年、1989 年。

⁸⁴ 仿拟海凡语。

⁸⁵ 陈平：“我们不能赢得革命，我们也没有因投降而蒙羞。”（陈平，2004：459）

⁸⁶ 海凡反思：“当发现它既不符合时代思潮，又偏离了本土实际，路愈走愈窄，甚至到了无疑为继的时刻，何去何从？。”（海凡，2014：184）这点迎合了陈平的回忆录：“武装起义需要相辅相成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来激起民愤。假如人民生活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陈平，2004：460）

平是理想主义的图腾，革命的旗帜，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也涉及了肃反的血泪史，到最后以一名老人的身份和海凡见面，并且帮海凡的家人搬沙发，且并列而坐。

从中可见海凡层层递进，将陈平的“图腾形象”去掉光环，还原成一名垂垂老矣的革命者。海凡并非第一位以陈平为写作对象的作家局内人，与众不同的是他所接触的陈平，已经失去历史使命、领袖光环，向战士和家属寒暄、谢罪。能以日记记下进入暮年的革命者——陈平，难能可贵。

红征之死

记载同志被处决的故事已不是新鲜题材，但“红征之死”是十分震撼的，而“红征之死”也透露了马共成员的心理素质。2月6日对海凡而言估计是不平静的一天。这天红征的姐姐进村寻亲，同志们十分焦虑，尤其负责接待的林军该如何“抚平骤然痛失亲人的家属心头的悲恸？”（海凡，2014：133），因红征是被处死的。红征的人际关系不好，海凡表示她因被排斥而患上癔病⁸⁷，但不否认红征有才华、有强烈的优越感。笔者以为，也许红征上队后难以适应这类集体主义的生活，又或许她很早就患上了癔病，辱骂领导在当时可大可小，因战斗仍未结束，军心不可乱。红征之死带给海凡的反思，也许是“集体吞没个人”的正当性，红征可能并不适合搞革命，所以她无法适应革命的生活。

在文明的世界里，精神病患者即便犯罪也可从轻发落，但是事情被公开化了⁸⁸，领导集团就面对难以下台的局面，而红征辱骂领导的举动，也许是癔病发作的

⁸⁷ 即“歇斯底里”，心理创伤是一病因。白日梦、语言错乱、梦游均为症状。

⁸⁸ 关押在大课堂集体监督，再开全体大会公开处理。（海凡，2014：132）

征兆，却可能因此造成部队的恐慌和混乱。“红征之死”给海凡最大的反思是集体的麻木与冷漠，因为在拍案处死红征的同时，大家都有统一认识，没有异议。唯独老杨提议让红征退伍，可惜为时已晚，作为革命党，退伍是必须秘密进行。

海凡扪心自问：

“她曾选择了革命，难道让革命革了她的命亦是她最终的选择？⁸⁹...她听到死亡的跫音吗？谁能透视她的内心？捍卫革命集体的利益与尊重一个叛逆的个体的生存权利之间，到底有多大的选择空间？”

（海凡，2014：133）

这是一次海凡对群己关系的一次认识。可见海凡以“红征之死”透视了集体的“歇斯底里”。因为除了老杨，竟然没人帮红征说话。

4.2.3. 理想的幻灭

共产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操作，目的就在于“组织”，在于将党员“组织”起来为了政治目标而奋斗。在过去，共产党有过中委的选举，却都是小圈子选举。整个组织都围绕着党中央来转，“团结在以陈平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海凡，2014：181）就是一例。故更多时候，部队的决策由陈平核心做主，包括生杀大权也无人过问。在党内，围绕着核心领袖和党的核心利益，成员基本不会关注个人利益和情感的表达。

⁸⁹ 大会裁决：“红征自绝于革命”（海凡，2014：132）

然而，在一次集会，海凡注意到领导（阿石）的权威在某些人心中开始走下台（海凡，2014：133-134）。军服代表着集体主义，但是当陆续有人换上便服，说明“组织”他们的作用也逐步松弛了，对集体的图腾也逐步疏离了。紧接着是新、马、泰三国同志的去留问题，因国籍不同而有不同的利益考量，泰籍同志会比马、新两国同志还要占优势，参与建村方面，泰籍同志可以要求马、新同志为他们效劳，不然也可以出去找工作，毕竟他们一直都在自己的国家。但是这对马、新同志是不公平的，也许因为他们出于劣势。马籍同志力争回国，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必须建村的需要，新籍同志则由于当时归国无门，被迫滞留，也被迫要担起建村的责任。国籍、处境不同，固然利益考量也有异（海凡，2014：165-166）。从各种冲突、急于脱离组织的情况来看，集体主义已经崩解了，连村管委会选举都一举将大部分老同志扫地出门，就可见求变心油然而生。

销毁武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结束，为失去历史使命的马共游击队更添悲剧色彩，所以才有此感：

“一个用武器支撑起来的理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此时此地，无论如何是幻灭了。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海凡，2014：143）

革命者没有了枪，好比失去了灵魂。海凡承受的心理压力是难以想象的，集体主义崩解了、武器销毁了，再来是获悉肃反的反应：

“中央队处决 17 人，12 支队处决 73 人。近三人未获平反。…。万万没想到我曾生活过十余年的部队，竟曾有过如此不堪回首的一页！”（海凡，2014：127）

这是全文最具史学价值的一环，因为表现了前马共成员的一种原罪意识。

第三节、小结：归来

海凡是幸运的，他后来成功返回祖国⁹⁰，在《协议》签署 25 周年之际，出版了《雨林告诉你》这本小集子。这是“马共书写”，尤其“感性呈现”的一次尝试。战士是人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功过待后人评价，一如海凡所言：

“倘若雨林有知，它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个个怎样的故事？”

（海凡，2014：185）

⁹⁰ 文中提及的刘波（海凡，2014：176），虽然和家人取得联系，却没有回国的机会。（刘鉴全，2004：223-225）

第五章、结语

搁笔之际，要为一部横跨四十年的斗争史及其文学产物作结论，确实并非易事。马共作家局内人词藻质朴，却更忠于“此时此地”的现实。纵观三作家的著作，均有涉猎死亡与溃灭。尤其是凝视死亡，这包括被敌军戮尸、饿死、自相残杀等悲剧。局内人的马共书写也是其思想的载体，结合各种的记叙与反思，其作品可以成为马共思想史的参照。他们的作品分别代表马共历程的重要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都存在对革命意义、群己轻重的反思。从而说明作家局内人之于文学史和共运史都有其独立、独特的地位，对于他们而言，“马共书写”既是创作，也是回应一段集体创造的历史。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与品味，从而显示出共产党员个人与党之间对于斗争方向和路线认知是泾渭分明的。

马共和联合邦政府均是马来亚人，历史是由胜利者和当权者书写的，但是失败者的历史也必须和胜利者的历史并列来看，更要有“世界格局一本土局势一个人认知”的视野。须先将双方还原成一个时代的人，比如驼铃写《硝烟散尽时》就是由于“这一段所谓的民族解放斗争跟英国人的一种压制所造成的灾难。”（驼铃、陈剑，2013：85）小说中有残障的马共老战士和战死的英军士兵。福特斯说：“士兵，你的本份就是牺牲。”（福特斯，2015：3）一名士兵为了理想、国家和上帝而战，无论在前线执行杀戮，还是凝视死亡和伤残，都是十分“个人”的问题。抗英战争是一个时代潮流所致，是一场“解殖”和“反共”的阵痛、是后来三十年内战的起源。内战造成的死亡与伤痛，迄今仍未抚平，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但是一个思想成熟

的新国家能凝视伤痛，反思历史。美国人对于内战的认知是同胞相残，却也把交战双方视为人，他们选用士兵的日记与信笺作为教学读本，期许下一代牢记历史。

历史的创伤与死难者，是仇恨的寄存处，也是寻求和解的桥⁹¹。是故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不妨重读金枝芒笔下“死亡的面孔”、驼铃笔下的“寂寞行者们”与海凡日记中在“风雨泥泞路跋涉”的足迹。就能将一个个马共战士还原成人，他们有生理局限、有欲望、有恻隐之心。马共加速了新国家的独立、英军和马来亚政府也抵御了共产主义的狂潮，摆脱意识形态的史观，不以成败论历史，双方终究只是人。文学即人学，尤其现实主义作家能更到位地表现人的心理状态。有了对于人的关怀（包括双方士兵），才能有历史的“感性呈现”。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他们在时代和社会中的地位，是更为客观的视角。唯有推己及人，国家才能真正走出内战的阴影。

三作家除了忠于“此时此地”（金枝芒、海凡）、批判斗争的残酷（驼铃）外，最重要的还是围绕着群己轻重的问题。如金枝芒曾因短暂退党而自责（金枝芒，2008：VI）又写“玉兰杀子”的惨剧、驼铃苦苦思索肃反的起源与解阵成员的犹豫不决、海凡写“被革命”的红征，都有其相似之处。共产主义运动和作家局内人的人生阅历融合在一起。朱学勤言：“马共历史是一部罕见的悲剧史”（刘鉴全，2004：10）结合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观之，就如福山所言：“二十世纪把所有人变成历史的深沉悲观主义者。”（福山，1993：3）在上世纪，人们都相信共产主义是

⁹¹福特斯如此说：

“‘死难者’没有了目的动机，没有了政治主张，他们任由幸存者处置。他们一度充任了南北持续敌对情绪的寄存处。但到了 19 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项利于南北联合的国家纪念工程之载体。内战的死亡与‘内战死难者’属于整个国家。...死难者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之焦点...‘无论南方或北方，我们全部人的死难者’..。”（福特斯，2015：263）

“永恒的极权主义”，故我们看金枝芒和驼铃的作品，讴歌革命和揭示革命的残酷是主轴，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斗争可以延续。如驼铃期许“走向大同”便是放弃武装斗争的另一种途径。然而海凡的日记仅仅写于“和解”隔年，是故海凡的日记呈现出福山所言的“虚无主义者的战争”，当人生不再血腥悲惨，“人会变得软弱，只关心自己的事”（福山，1993：428）当马共的革命不合时宜，当“两尺宽的肩膀”（海凡，2014：187）卸下了半世纪的风雨。昔日革命者成了真正关心自我的“最后之人”，不再有昔日的“优越愿望”（福山，1993：434-436）。然而革命者表现最个人的情感还是情有可原的，尤其在共产阵营相继解体的年代，昔日对“优越愿望”的追寻已经不合时宜。

今年是“十月革命”（1917）一百周年，共产主义的幽灵早已烟消云散。三作家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及其时代的故事，和许多共产党成员晚年的回顾与反思虽然相近，但是它摆脱了政治色彩，更具“人性化”。革命有溃灭，有新生，但不一定带来仁政⁹²。倘若雨林有知，它要告诉世人的故事应该是一部人性化的心路历程、精神思想史。笔者期许这部拙作是一部马共的、迷你版的《倒转红轮》⁹³。

⁹² 详见：金雁《倒转红轮》页242。

⁹³ 全名《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第六章 参考资料

一、专书

中文书籍

1. 阿布·沙玛著、阿凡提译（2005），《历史与独立斗争——马共中央委员阿布·沙玛回忆录》，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2. 阿成（2007），《我肩负的使命》，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3. 阿成（2009），《一路艰辛向前走——我肩负的使命（续）》，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4. 阿都拉·西·迪著、阿凡提译（2008），《阿都拉·西·迪回忆录》（上），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5. 阿都拉·西·迪著、21世纪出版编辑部译（2009），《马来西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6. [俄]巴赫金（2009），《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7. [美]本尼迪克·安德森（2010），《想象的共同体》，台北：时报文化。
8. [美]本尼迪特克·安德森（2012），《比较的幽灵》，南京：译林出版社。
9. 波澜著，陈剑编（2015），《葵山英姿》，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10. [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2015），《这受难的国度》，南京：译林出版社。
11. 蔡求真（2003），《四十年森林游击战争生活回忆录》，勿洞：泰南第一友谊村印行。

12. 陈平等著，方山等译（2004），《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
13. 陈思和（2003），《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4. 陈思和、许文荣主编（2014），《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15. [美] 法兰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译（1993）《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台北：时报文化。
16. 方山编（2004），《历史的告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马共党军分裂纪要》，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
17. 方山编（2005），《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至四集，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
18. 方壮壁（2000），《新加坡啊！新加坡...——一个独立斗士的呼声》，雪兰莪：大汉山文化出版社。
19. 高华（201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 海凡（2014），《雨林告诉你》，八打灵：文运企业。
21. [美] F.A. Hayek 著、殷海光译（2013），《殷海光全集 4·到奴役之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2. [美] Hannah Arendt 著、蔡英文译（1983），《极权主义》，台北：联营出版事业公司
23. 宏胜（2013），《参军·出国·边区·下山》，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
24. 黄锦树（2015），《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台北：麦田出版。

25. 黄锦树（2013），《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台北：麦田出版。
26. 黄锦树（2015），《注释南方：马华文学短论集》，台北：有人出版社。
27. 金枝芒遗著（2004），《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英战争小说选》，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28. 金枝芒遗著（2008），《饥饿》，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29. 金雁（2012），《倒转红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0. 雷子健（2014），《谁杀了钦差大臣？：紧急状态那些人那些事》，雪兰莪：胡一刀办公室。
31. 李泽厚（2008），《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2. 林雁（2001），《永恒的虹影》，加影：雪兰莪加影牛骨头山殉难烈士家属委员会出版。
33. 刘鉴全（2004），《青山不老——马共的历程》，吉隆坡：星洲日报。
34. 吕方上（1994），《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5.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36. Mohamed Salleh Lamry 著、谢丽珍译（2007），《马来左翼运动史》，八打灵：策略与资讯研究中心。
37. 南军（2014），《迈步征程》，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38. 拉昔·迈丁著、阿凡提译（2006），《马共中央委员拉昔·迈丁回忆录：从武装斗争到和平》，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39. 鲁迅（2008），《鲁迅译文全集》第五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40. 钱理群（2011），《我的回顾与反思》，台北：行人文化出版社。
41. 钱理群（2012），《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下册，台北：联营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42. 全仲仁（1998），《马共内部风暴》，勿洞：考康南地道委员会。
43. 邱依虹著，黎绍珍等译（2004），《生命如河流——新、马、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44. 驼铃（2011），《寂寞行者》，金宝：漫延书房。
45. 驼铃（2012），《驼铃自选集》，金宝：漫延书房。
46. 驼铃（1995），《硝烟散尽时》，怡宝：霹雳文艺研究会。
47. 王德威（2011），《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48. 文羽山编、刘亚炎口述（2017），《路漫漫——陈平的北上历程》，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49. 夏济安（2016），《黑暗的闸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50. 秀兰（1983），《我要活下去——一个前女共产党员为党斗争的惨痛经历》，雪兰莪：星报（马来西亚）出版有限公司。
51. 杨立新（2015），《艰难的路程》，勿洞：泰南勿洞人。
52. 一川（2012），《突击队·阿沙与我》，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53. 殷海光（2013），《殷海光全集 5·光明前之黑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台北：台大出版社。
54. 应敏钦（2005），《第十支队与独立》，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55. 游砾译（2007），《伊斯兰·马来人·共产党》，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56. 余英时（2004），《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三民书店。
57. 张佐（2005），《我的半世纪》，吉隆坡：张元。
58. 朱齐英（2009），《马来亚民族运动史料选辑》（下），吉隆坡：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59. 足印丛书编委会编（2014），《拂去灰尘的记忆》，香港：足印出版社。
60. 21 世纪出版社编辑部（2013），《十年——抗英战斗故事辑》第一至五辑，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

英文、马来文书籍

1. Aloysius Chin (199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 The Inside Story*, Kuala Lumpur: Vinpress
2. Cheah Boon Kheng (2007) *New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on Malayan History*, Malaysia: MBRAS.
3. Cheah Boon Kheng (2012) *Red Star Over Malaya, Singapore* : NUS Press,.
4. Ching Fatt Yong (1997)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5. Leftenan Kolonel (B) Baharudin Bin Tassin(2001) *Tentera Darat Menentang Insurgensi Komunis 1968-1989* . Malaysia : Markas Tentera Darat.
6. ShouChou Yao (2016), *The Malayan Emergency –Essays on a Small, Distant War*, Singapore: NIAS Press

7. T.N. Harper (2001)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Wan Hamsah Awan (1994)*Baling Membuka Jalan Damai*, Selangor Kajang: Masa Ent.

二、学位论文

1. 谢诗坚（2009），〈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槟城韩江学院出版

三、期刊论文

1. 何启才（2013），〈马来亚共产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6月第二期。
2. 何启才（2013），〈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马来亚共产党史略〉，《中文·人》，第二期。
3. 何启才（2015），〈马来亚共产党的南下策略与意义〉，《人间思想》，2015年夏季号。
4. 林恩河（2017），〈马来亚的国家想象：新加坡人民的马来亚梦〉，《怡和世纪》，2017年2月至5月，第三十一期。
5. 潘婉明（2011），〈文学与历史的互相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10月1日。

6. 潘婉明（2017），〈海凡《可口的饥饿》序〉，《怡和世纪》，2017 年 2 月至 5 月，第三十一期。
7. 魏月萍（2011），〈马来马共的论述与制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十四期。
8. 原不二夫（1998），〈抗日战争时期的马来亚共产党干部〉，《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二期。

四、报章杂志

1. 驼铃、陈剑（2013 年，3 月）。〈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上。《燭火》，第三十九期，页 79-85。
2. 驼铃、陈剑（2013 年，6 月）。〈陈剑与驼铃文学对话〉下。《燭火》，第四十期，页 74-86。
3. 杰伦（2013，3 月），〈一个家庭悲剧的书写带出深沉历史记忆：评论驼铃《硝烟散尽时》〉，《燭火》，第三十九期，页 74-79
4. 袁博文（2016 年，10 月 12 日）。〈昨日丛林兵，今日老百姓〉，《星洲日报·活力副刊》，页 A01-A09。

五、引用互联网

1. 庄华兴（2012）：〈金枝芒系年〉，《雨林小站》，2012 年 2 月 1 日，阅自：http://freesor.blogspot.my/2012/02/blog-post_8658.html。

2. 潘婉明（2015），〈政治不正确与文学性：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燧火评论》，2015年2月28日，阅自：<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228/>